

现代外国 哲学论集

XIAN·DAI·WAI·GUO·ZHE·XUE·LUN·JI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509776

书号 B15
X11 3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目 录

要积极开展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长 杜任之 (1)
- 欧行哲学见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洪 谦 (6)
- 亨普尔教授在北京讲学罗嘉昌 (18)

卡尔·波普尔的哲学舒炜光 (2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徐崇温 (45)

关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辨析李幼蒸 (73)

关于萨特的评价问题

——与张英伦、柳鸣九同志商榷袁淑娟 (87)

现代自然科学与宗教

——评现代国外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宗教观赵鑫珊 (102)

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

——南斯拉夫当代社会学的发展贾泽林 (125)

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童天湘 (146)

实用主义实践观述评刘放桐 (160)

H·赖辛巴哈其人及其哲学羽 黛 (181)

同时代人回忆赖辛巴哈羽 黛摘译 (189)

国外现代比较哲学研究概况羽 群 (193)

《现代世界的人道主义》译介李亚卿 (202)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述评 易克信 (226)

苏联新书《唯物主义辩证法》简介 李亚卿 (238)

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 刘 伸 (242)

希望, 现在……

——萨特关于哲学问题的最后一次谈话 辛 未摘译 (249)

爱丽丝·墨多奇谈萨特 羽 群摘译 (284)

要积极开展现代外国 哲学的研究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理事长 杜任之

《现代外国哲学研究》问世了，我祝贺它的诞生，希望它有助于促进我国学术界积极开展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

研究现代外国哲学，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且以现代西方哲学为例来说吧。这是现代外国哲学中最活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之后，现代西方哲学和各种流派相继出现，诸如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等等，层出不穷。与古典的西方哲学流派相比较，现代西方哲学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但从总的方面看，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西方哲学又有一些新的演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影响较大的新的哲学流派的产生，例如结构主义、释义学以及各种“科学哲学”；与此同时，在一些旧的哲学流派内部则发生了新的分化，如美国奎因以后的分析哲学、过程哲学等就是从这种分化中产生出来的。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这样的现象：一些原来分歧很大的哲学流派开始相互妥协，甚至在某个方面彼此“融合”，如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靠拢，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汇合都日益明显。甚至某些宗教哲学也与非宗教的哲学接近，比如

新托马斯主义者中有的人就主张同异教徒或无神论者对话。而特别引人注目的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1968年“五月风暴”后其影响迅速扩大。

现代西方哲学不同于古典西方哲学的特点，除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使得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锋中展开自己的观点。有的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回避态度（如德国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在他的著述中很少提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用他们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衡、争高低。而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有不少人开始宣称自己“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或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充实”他们的哲学；或用他们的观点来“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干脆自称或被称作“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甚至还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自居。

在现代外国哲学中，有许多流派同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实用主义长期被奉为美国官方或半官方哲学；尼采唯意志主义曾充当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除了与尼采哲学和实用主义有关外，还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强大影响；新康德主义曾经支配过第二国际的思想政治路线。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左派”运动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以萨特后期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的。有的“新左派”把马尔库塞推崇为“先知”、“新左派思想的守护神”、“国际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

从上述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面貌和演变的简略一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为了了解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潮，掌握他们针对当

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所提出的新问题、新理论，也无论是为了研究和分析外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评论，我们都应该积极开展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

积极开展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也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蒙昧主义的闭关锁国政策，中断了我国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致使我国学术界中本来就薄弱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更加落后，甚至处于耳目闭塞的状态。在个别青年人中出现的对现代外国哲学盲目崇拜，正是这种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后果。其实，对待现代外国哲学一概否定也罢，盲目推崇也罢，都反映了对事情缺乏分析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得以形成和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根源于对现代外国哲学不了解、少研究。

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重要性，更表现在它对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意义上面。由于在现代外国哲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指责，是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观点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为借口，要求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就是深入地剖析这一切。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批驳他们的无理攻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汲取他们提供的思想资料，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要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马赫主义哲学时，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列宁全集》14卷，第362页）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比七十年前更加复杂的现代和当代外国哲学时，重温列宁的这个论述，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

学更有教益。

为了实现我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我们也需要更好地进行对外的学术交流。在国外有多种名目繁多的哲学研究会。既有对“马克思学”的研究，又有对一些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研究。以我们的近邻日本对存在主义的研究为例，他们不但有一些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研究会，而且早在五十年代就几乎翻译出版了萨特的全部著作。相形之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哲学界，无论在翻译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做得都很不够，如果不迅速地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怎么能够使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同国外学术思潮的交流中，在新的实践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使我们的社会科学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呢？

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要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过去我们在对外国哲学的研究中存在“左”的毛病，出现过不是在弄清事情的全貌的基础上去分清是非，而是把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批判”摆在第一位。学校开这门课程，名字只能叫“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写文章题目也离不了“批判”两字。因而有时存在抓住某个外国哲学家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作简单的否定。这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某些外国哲学家恶意诋毁、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无疑应当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但这种驳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必须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坚持实事求是不仅意味着对别人的错误的批驳要有充分根据，要具体分析，而且也意味着要敢于肯定现代外国哲学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我们必须否定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也应该肯定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任何形式的虚无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格格不入的。当然，同批判一样，肯定也要有根据、有说服力，不能搞简单化的、错误的肯定。

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除了现代西方哲学之外,还有苏联东欧各国的哲学、日本的哲学、印度的哲学及其他国家的哲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研究更薄弱,今后也应给以适当的注意。

最后,应当指出,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现代外国哲学的研究方面有了可喜的进展,情况和资料的翻译加强了,有关现代外国哲学的论著也开始陆续出版。但总的来说,离客观需要还相距很远,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开拓现代外国哲学这块园地,使它早日百花盛开吧!

欧行哲学见闻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洪 谦

去年秋季，我去欧洲跑了一趟，在奥国的维也纳和英国的牛津，呆了几个月。这两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旧地重游。但是，现在维也纳和牛津同几十年前则无法比较了。那里的一切如我首次到欧洲那样，使我感到非常陌生，摸不着头绪。因此，我写的下列这些见闻——特别是有关学术文化生活——无疑是表面的、片面的，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看法。

维也纳是我青年时代上大学的地方，我在那里呆的比较久。维也纳大学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所谓维也纳学派的所在地，是当前国际哲学界仍相当流行的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发源地。但是自从1936年石里克(M. Schlick)被谋杀以及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不仅维也纳学派这个学术团体，就是从马赫(E. Mach)开始，经过波尔兹曼(L. Boltzmann)继续下来的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都在维也纳大学中消失了。以后，代之而兴的，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杂质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新托马斯哲学。简言之，当前维也纳大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和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这是维也纳大学近百年的历史中罕见的现象。

但是，尽管如此，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思潮并没有在奥地利消失，只是它的中心从维也纳大学移到格那支大学了。在那里，以托皮奇(E. Topitsch)、哈勒(A. Haller)和弗洛德利希(R.

Freudlich)等教授为支柱,继承那一学派的历史传统,并吸收了近年来逻辑、数学和物理各种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种新的分析哲学学派——“格那支学派”。他们还出版一种哲学期刊:《格那支哲学研究》。如同它的副题所标示那样,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分析哲学刊物”,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

我这次去维也纳的目的,是应奥国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之请,参加其去年召开的第五次会议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如往年那样,为数很多。会议中提出的论文就有二百多篇。我估计,到会者以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北欧诸国的人和西德人、奥国人最多,荷兰人、意大利人次之。此外,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仅有个别人参加。来自东欧的则有匈牙利的两位哲学家,南斯拉夫也有人参加这次会议。来自亚洲的仅有两个日本教授和我共三个人。从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维特根斯坦哲学在那些国家的影响的一点眉目了。

这次国际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的总题是:“伦理学:基础、问题和应用”。在这个题目之下,分为如下的五个小组:(1)维特根斯坦,包括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班;(2)伦理学,伦理逻辑和元伦理学;(3)伦理学和社会科学:判定伦理和行动论;(4)伦理学和正义;(5)医学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伦理学和宗教。从讨论会的实际活动情况看,第一组最为活跃。关于维特根斯坦哲学就开了四次讨论会:(1)“逻辑哲学论”之一:原子论和原子命题;(2)“逻辑哲学论”之二,“逻辑哲学论”的哲学问题:认识论;(3)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一:语言应用中的意义:博弈(game)和规则;(4)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之二:语言哲学和博弈。

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讨论班也开了三次会议:(1)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论和语言哲学;(2)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超验主义;(3)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伦理观点的比较。第二组的活动情况次之;第

三组又次之,第四组和第五组同以上各组比较起来,则大大落后了。

一个国际性的经验主义的分析哲学会议,过去总是以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或逻辑哲学为题目,这次讨论会竟以伦理学作为讨论的对象,这倒是一件新鲜事。无庸讳言,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流派,从维也纳学派开始,就没有足够重视伦理学,就没有把伦理学摆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虽然英国的分析哲学家如B. 罗素和G. E. 摩尔等对伦理学持不同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哲学趋向从三十年代开始,就被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思想洪流所冲淡了。维特根斯坦在该书中对于伦理学问题的看法主要的只说了那几段话(该书642—6423)^①,而且那些话更能使人对伦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抱消极的看法。的确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既应有其完整的理论哲学部分,也应有其完整的实践哲学的部分。例如,康德哲学有其三大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此,无怪乎罗素曾经概乎言之:“逻辑实证主义这类哲学,严格说来,没有哲学,仅有方法论。”

但是,伦理学在分析哲学中的情况,近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变化。例如C.斯蒂文森(L. Stevenson)的《伦理学和语言》,哈尔(R. M. Hare)的《道德的语言》和诺威斯密史(P. H. Nowellsmith)的《伦理学》这些著作,从不同的方面给伦理学奠定了分析的理论基础,开辟了对这门学科的新的研究道路。在方法论方面,布莱特怀特(R. B. Braithwaite)在他的《作为道德哲学家的工具的博弈论》(the game Theor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应用数学理论在伦理哲学中的启发性看法。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所谓判定论(Theory of decision),行动论(Theory of Action)和伦理逻辑(Deontic Eo-gic)等逻辑理论创立或发展了。它们都给伦理学这门学科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逻辑根据和哲学基础,因而也给召开这次关于伦理

^① 维特根斯坦于1930年曾作过“论伦理学”的报告,发表在《哲学评论》第74页。

学的国际分析哲学会议以充足的理论和有利条件。而且这种新的方法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以及这种新的伦理哲学的趋势，在这次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这次讨论会的各个小组中，对于博弈论，判定论，行动论和伦理逻辑在伦理学中的应用的讨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怎样应用它们并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研究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关于义务、责任、应该、必须、容许、禁令和善恶的理论基础，概念定义及其应用问题。另一方面怎样了解这些理论在伦理学中的应用范围、界限、优点和缺点，乃至其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问题。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各小组中都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因而在讨论会中都引起针锋相对的争论，引起巨大的分歧。

关于维特根斯坦以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方面，从提出的论文来看，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从维特根斯坦的原子命题中如何区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逻辑原子论的异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于维也纳学派，特别是对石里克的影响如何？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的关系怎样？如何评价语言应用中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的博弈论？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讨论班，也许可以概括成为下列一些问题：维特根斯坦的康德主义和语义学的关系怎样？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康德哲学家么？是所谓“语言的超验主义者”么？如果是，他们中间有无界限？如何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来了解康德的伦理学立场？康德的“绝对伦理学”和维特根斯坦“分析伦理学”关系怎样？关于意志和思维在“逻辑哲学论”中的如何解释？等等。

这次会议上，有些小组的论文和发言，都不约而同地批评了逻辑实证论的感情伦理学，批评了经验主义传统的功利主义和幸福观；还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的局限性即伦理学的局限性”这一点也提出了批评。

这次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讨论会，总起来说，是开得成功的。抛开许多论文和发言中的资产阶级观点不谈，大多数论文和发言，还是言而有据，细致深入的。人们感到不足的就是（1）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是数学家，逻辑学家，物理学家和计算科学家，纯哲学家为数不多；他们应用的术语过于专门，论证的专业技术性很强，加上各有各的逻辑符号系统，因而非常难懂，而且太重视细节问题，因而倒模糊了哲学的基本问题；（2）会议中德、英两种语言同时应用，忽而德文、忽而英文，有时引起一定的混乱。我觉得北欧的人对英、德文说、听都好，西德、奥地利人对英文听很好，但说起来难懂；其他如意大利、法国诸国的人对英、德文听、说都较差；英国人对德文有的说、听都很好，但多数人说不如听；美国人的德文，据我所知，在这两方面都比较差，似乎既不能听也不能说，我想读一定会吧！（3）论文的讨论时间不充足，不能畅所欲言，这也是憾事。

这次的讨论会安排得很好，在开会之外，有充分时间供到会各国的人自由交谈。以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大家谈得都很融洽，没有什么国家成见，也很少谈哲学问题以外的问题。仅有一次，一位北欧的教授对我说：“幸而历次讨论会没有苏联人参加，否则这个讨论会就变成联合国会议了”。我问他：“保加利亚的人怎样？”他说：“前年有几位保加利亚的哲学家参加这个会议，他们的论文和发言，都表现出对分析哲学的爱好，特别是对维特根斯坦的爱好，没有什么‘教条’的气味，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必谈了。据我所知，只有东德人在这方面较之苏联有过之无不及”。他还开玩笑地对我说：“东德的签证比去你们的国家的签证还要难。”

最后，会议组织处还为我们安排了告别宴会和参观，在塔那塔包哈的村庄，这是维特根斯坦做过六年小学教员的地方，以及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为他的姐姐设计的住宅。这个建筑物是在奥国著名建筑师洛斯(Adolf Loos)影响之下设计营造的。如今已成了当

前旅游者参观的“古典建筑物”之一了。

会议结束后，我在维也纳休息了数天，并参观了维也纳大学。几十年后的今天，它对我虽然似曾相识，已经不得其门而入了。幸而我的朋友，国际知名的现象学家 U 博士，特地为我从度暑假的意大利南蒂洛赶回维也纳，并陪我参观其庞大而设备华丽的哲学研究所。它座落在新建的老大学旁的高大楼房里。我同时还去李比希巷，石里克的哲学研究所所在地，和波尔兹曼巷的二楼，这是石里克小组每星期四晚聚会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仍然如旧，人虽去而楼不空，但对我来说，诚有难言的今昔之感。美丽的维也纳，虽然一些名胜古迹依然光彩夺目，著名的国家歌剧院和布尔格剧院等等依然如故；但是市内交通拥挤不堪，小汽车到处奔驰，旅游者穿梭街道，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繁华的商业气氛，当年那种宁静优雅，古色古香的色彩不复存在了。那位 U 教授对我说：“你所想象今天的维也纳是这样的维也纳吗”？我们对此都非常感慨。

数天之后，我就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转往别了三十余年的牛津。当我到达那里和见到接我的学院朋友的时候，我的感觉如同到达维也纳时一样，恍惚不知道这是在做梦，还是现实。这确是一种难于形容的复杂心情。牛津的市容大体上变化不大，市中心那些学院、教堂和图书馆等，庞大的中世纪的歌德式建筑物，依然林立在街头巷里。High Street 依然是牛津的大道，Cornmarkt 和 Westgate 依然是商业中心，公共建筑物如市政厅，邮政总局等依然在 Cornmarkt 的交叉路旁，著名的 B. Blackwell 和 G. Parker 书店以及许多旧书店，还有一些学院和世界著名的 Bodleian 图书馆依然在 George Street 那一带。牛津市外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这里几乎无法认识，更繁华了，热闹了，交通堵塞于途，噪声振耳，行人拥挤于道，互不相容，又加上许多庞大的百货公司，顾客盈门，走无隙地，据说：“牛津是现在英国商业中心之一”。这些时代的产物给

这座古色古香、宁静雅致的大学城以极不协调的气氛。以我所闻，这一点使心怀向往因而前来参观这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古城的国际旅游者，都感到美中不足。

我到那里时，牛津大学还没有开学。我抓紧这个时间，了解有关维特根斯坦和逻辑经验主义今天在英国的情况。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西欧哲学中有广泛影响的人物之一。三十年前我在那里时，是他的鼎盛时期，今天他的影响虽不如前，但在英国显然有不少维特根斯坦学者继续从事他的研究，而且每逢什么哲学讨论会和每讨论什么哲学问题时，仍然没有不提到维特根斯坦的，没有不引证他的话作为论据的。我个人虽然没有被他“迷住”，但我对他的哲学也有一定的兴趣。这次在牛津，我见到我的朋友B爵士时，他首先就问我：“你有没有忘记1945年在All Souls学院我们一道听维特根斯坦关于Gogito ergo Sum的冗长报告呢？”我说：“如果你不提，我倒忘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钻研他的几部著作如《逻辑哲学论》，《笔记》，《蓝皮书和褐皮书》以及《哲学研究》。但他后来出版的遗著，主要的如《哲学论释》，《哲学文法》，《论确定性》，《字条集》(Zettel)，以及《杂文选》，还有许多出版了的维特根斯坦的讲义和史料以及他的通讯，我都没有见到过。而这种种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和评论都是有阅读的必要的。因此，我必须在这方面补补课。我在图书馆中见到关于解释或评论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不下一百余种之多。但我很少看第二手材料，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看法和思路。然而我也觉得，事后看点这方面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到牛津后的第三天，就去访问我曾经呆了较久的N学院，但是，那里的一些老朋友，大都出国度假未归，仅有还恍惚认得我的一位先生引导我参观过去我常去的地方，如办公室，教员休息室和图书馆等。提到N学院，它和维也纳学派的经验论在英国的发展有

历史性的联系,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魏斯曼(F. Waismann)在这里任教多年,英国著名的逻辑实证论者艾耶尔(J. A. Ayer)也在这里任教过。前者已逝世多年,后者已退休有年,移居伦敦了。现在N学院的哲学主任教授是杜麦(M. Dummett),他是一位杰出的分析哲学家,但他的观点和逻辑经验论有些距离,和弗莱格(Frege)等的逻辑实在论比较接近。这里有必要提到的,就是另一位牛津的杰出的分析哲学家奎因顿(A. Quinton),他似乎多少受了魏斯曼的影响,但思想比魏斯曼开阔,不为维特根斯坦所束缚。他试图在调和逻辑经验论和逻辑实在论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他在英国哲学界是有一定影响的。

作为逻辑经验论学派在牛津大学的主要代表除了奎因顿之外,还有麦克吉尼斯(B. F. McGuinness)他是国际著名的维特根斯坦学者,他和皮尔斯(F. P. Pears)一道根据维特根斯坦本人对“逻辑哲学论”的英译要求,重新译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价值如何,英国的哲学期刊《精神》就有如下的评论:“我们对皮尔斯和麦克吉尼斯表示感谢的不仅在于:他们完成了《逻辑哲学论》更好的译本,同时也因为这个译本已经达到圆满的地步”。麦克吉尼斯还译了维特根斯坦其他的著作,博得国际哲学界的好评。他所编译的《L. 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一书,是研究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影响的重要读物。他是“维也纳学派丛书”编委之一,这部丛书下列的几种译本都是他主编的,(1)L. 波尔兹曼《理论物理学和哲学问题选集》;(2)考夫曼(F. Kaufmann):《数学的无限性—逻辑—数学论文》;(3)F. 魏斯曼《哲学论文集》,其中有奎因顿精采的绪言;(4)H. 哈恩《经验主义:逻辑和数学,哲学论文集》。还有魏斯曼的《逻辑、语言、哲学》的德文本也是由他和G.P. 贝克整理出版的。麦克吉尼斯为此书作了一个在出版方面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中间意见分歧的历史性的《后记》。这个《后记》也能说明维特

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距离和分歧。

当前逻辑经验论在牛津虽然没有象三十年前那样流行，但也并没有如我们有些人传说的那样“已经过时了”。它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各地也并非“过时”。至于三十年以前在那里同样流行的牛津剑桥的语言分析派、即所谓“Oxbridge 分析派”的情况怎样呢？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如罗素，G.E. 摩尔，维特根斯坦和 J. 魏斯頓(剑桥)，G. 赖尔，H.H. 普赖斯，J.L. 奥斯汀和魏斯曼(牛津)虽然已经逝世多年或退休了，但这个学派并不因之停止不前，反而这些年来有了新的进展。这个进展是在所谓“哲学逻辑”基础上形成的。我的牛津朋友、国际知名的实证主义的法哲学家 H 教授对我说：“现在 Oxbridge 的分析哲学的趋势和我们在 N 学院的时候不同了。这些年来，牛津的哲学思想中心既不是维特根斯坦，也不是逻辑经验主义，而是溯源到 G. 弗莱格、维特根斯坦以及经过 W. V. 奎因、S. A. 克里普克而形成的‘哲学逻辑’分析派，这一派在牛津大学的代表，主要的是斯特罗逊，杜麦和 G.J. 瓦纳克等”。经我和其他牛津哲学家谈论，证明 H 教授这种看法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种“哲学逻辑”的分析派的确是当前牛津分析哲学的主流。

尽管这类的语言分析派是那里的主流，但也不如三十年前的维特根斯坦或逻辑经验论那样，渗透了牛津哲学界的一切活动。现在仍然有人坚持以 R. 卡尔纳普为代表的以日常语言作为逻辑分析对象的对立观点；N. 乔姆斯基、D. 达里逊、J. R. 西尔斯、J. 卡茨和 H. 普特曼等的语言哲学在那里也很有影响。谈到科学哲学问题时，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尔和 C.G. 亨普尔等仍然受到重视。谈到分析哲学的认识论时，罗素，G.E. 摩尔，石里克，卡尔纳普，O. 纽拉特和波普尔、艾耶尔等人，仍然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此外，还有其他的外国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在牛津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的注意，仅仅是在牛津哲学讨